

學標準來治療癲病的正統位置亦因此進一步得以鞏固。

平情而論，按照梁氏的說法，環顧中國人感染和治療癲病的歷史，西方所謂「現代化」的過程斷非所有文明的必經道路，明清以來社會對癲病的處理，事實上與西方的防治方法成效相近，彼此分別不大；至於中國與西方列強對癲病的歧視，實際上也反映出「中華天下觀」與「西方中心世界觀」的異曲同工，兩者對於癲病與「文明」、「落後」、「他者」、「我者」關係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

就「身體政治」的議題而言，由於癲病是一種「能見度」甚高的厭惡頑疾，故政府能否妥善、徹底地把

它消滅，往往便是國家現代化成功與否的標準。1949年以後，中共政權首次將癲病防治列為國家發展的重點政策，對農村癲病流播的監控亦愈趨着緊。及至1951年，中共更逐步成立「全國性的防治網絡」，大力打擊癲病在農村、城市的廣傳。而在聯合化療 (Multi-Drug Therapy, MDT) 成功研發的1990年代，癲病的流行率在中國亦得以大幅下降，中央政府遂因此以「有效控制癲病」的成就來標示其改革開放的成果 (頁177-213)。顯然，癲病斷不只是醫護人員、病人，以至社會大眾關注的病理問題；它在政治、外交領域上所盛載的意義亦是醫療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 革命概念的法理重釋

### ● 周尚君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著，陳周旺譯：《論革命》(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英國學者加諾芬 (Margaret Canovan) 不無豔羨地稱，阿倫特 (Hannah Arendt) 從古代希臘城邦世界中找到了一個反思一切政制問題的阿基米德點，「站在這個立足點上，她把批判的眼光投向了我們自以為理所當然的思考和行動方式上」(加諾芬：〈導言〉，載阿倫特著，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

儘管阿倫特對所有的革命多有不滿，並認為它們都是誤入歧途的虛假政治，但對於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和一種本體論現象的「革命」概念本身卻抱持着同情與敬仰。

難道刻下(或現代)一切成就的取得只有在與過去(或傳統)絕對對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現代成就是否唯有透過革命才是可能實現的？——這背後支撐的是何種觀念要素與思想形態？

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從這個阿基米德點出發，阿倫特在探索了分工與勞動、權力與和平、世界事務與人類事務、極權主義與現代政制等險要話題之後，在她學術人生的最後階段(1963-1975)，處理了一個在思想史上最為嶄新又多少有些激人奮進的話題：革命。

如漢森(Phillip Hansen)在為阿倫特寫的卓越傳記中所說的那樣，阿倫特對革命的闡釋是她在政治理論方面最後一項殫精竭慮的工作，而且這項工作是「恢復我們『政治』遺產的一種特別的現代嘗試」，是一種「城邦再創造活動」(漢森著，劉佳林譯：《漢娜·阿倫特：歷史、政治與公民身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194)。儘管阿倫特對所有的革命多有不滿，並認為它們都是誤入歧途的虛假政治，但對於不僅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更作為一種本體論現象的「革命」概念本身卻抱持着同情與敬仰。這位政治思想界的「奇女子」，為了試圖明瞭「政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性質，不得不在革命的「現代密林」中冒險跋涉，其中《論革命》(*On Revolution*，引用只註頁碼)就是這場學術跋涉與冒險的傑出成果。

阿倫特說，現代「科學」，無論是心理學還是社會學，都以揭露真相為己任。真相，這是著「原史」的古希臘史家所不屑於關注的瑣事，然而它卻成為了現代「科學」的核心。造成這種轉換的原因和意義若何？從現代政制史上作何解？施特勞斯(Leo Strauss)說，自馬基雅

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以降，這一轉換使得自然權利觀的根基不再能夠追溯至宇宙目的論了，更遑論神義論。也因此，霍布斯(Thomas Hobbes)不得不開始發掘現代政制的邏輯開端，這個開端恰好不是某種理性，而是人的情感(施特勞斯：〈前言〉，載施特勞斯著，申彤譯：《霍布斯的政治哲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1-8)。傳統的自然法是一種先於人類意志的客觀的法則和尺度，它被人類意志創始的現代權力觀念所替代，而人類意志當中最基礎的意志就是感覺。

在這一世俗理論的支配下，阿倫特卻發現，現代「科學」語境下的政制並未給予人們某種確定無疑的對未來權力與和平問題的答案，「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未來感到無法預料」(鄂蘭[Hannah Arendt]著，林驥華譯：《極權主義的起源》[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5]，頁1)。同時，我們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期待預見未來甚至支配未來。在這種矛盾和迷亂的文化心態面前，現代人匆匆忙忙地開展了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像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說的那樣：

1789年，法國人以任何人民所從未嘗試的最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為此，他們百般警惕，唯恐把過去的東西帶進他們的新天地：他們為自己制訂了種種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與父輩迥異；他們不遺

餘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托克維爾：〈前言〉，載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29。)

令這位法國思想家倍感困惑的是：人們似乎「一夜之間」失去了與歷史和解的所有耐心。他們在摧毀了政治機構以後，又廢除了民事機構；在變革了法律之後，又改變了風尚、習俗甚至語言；摧毀了政府結構以後，又動搖了社會基礎，他們似乎要清算世間的一切。以至於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驚奇地發現：「陰謀、屠殺、行刺，對某些人來說乃是獲得一場革命的微不足道的代價。」(柏克著，何兆武、許振洲、彭剛譯：《法國革命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85。)不論箇中評價如何，我們不禁要問：難道刻下(或現代)一切成就的取得只有在與過去(或傳統)絕對對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其中隱含的提問是：現代成就是否唯有透過革命才是可能實現的？——這背後支撐的是何種觀念要素與思想形態？

一般而言，革命意味着「暴力」、意味着「戰爭」。但是，阿倫特說，與擁有悠久傳統和古典內涵的「戰爭」概念相比，「革命」卻是一個嶄新的語詞(頁2)。戰爭是有史以來最古老的一種現象，只是到了現代，戰爭才同革命一道，在相互糾結和「合謀」中終結了自己的古典素質。恰如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所言：「直到了基督紀元二十世紀

初，戰爭才開始進入到它可以毀滅人類的時代。」因為「在過去，人類從來不曾處在這樣的境況：品德上沒有取得值得重視的進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確的指引，卻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毀滅其自身的工具」(邱吉爾著，吳澤炎等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海口：南方出版社，2005〕，頁37、39)。戰爭由一種「戰爭的事業」演變為一種「戰爭的技術」。然而，阿倫特發現，要命的是，戰爭的技術並沒有被人們所控制，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戰爭史上，保衛國家和平民的戰爭任務從來沒有被真正履行過，戰爭已經成為了一種滯後的、本質上毫無作用的報復(頁4)。

與之相應，革命引導着現代人一代一代地前赴後繼。如果說戰爭引導了古典時代的主題(如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今天則是革命消滅了古典的戰爭，用一種戰爭的技術作為革命的序曲，開啟了一個沒有終點的革命新世紀。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被稱作「大革命」，而英國和美國革命難獲此「殊榮」，柏克的「震撼感」有效說明了此次革命之「大」，他驚呼道：「法蘭西豈只喪失了舊政府，簡直喪失了一切政府，與其說法蘭西必當成為人類的災難與恐怖，不如說它幾乎成了屈辱與憐憫的對象。但是，從這座被謀殺的君主制的墳墓中，卻走出來一個醜陋、龐大、超出人類全部想像力的可怕的怪物。」(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頁43。)目空一切的革命車輪崩斷了柏克敏感

革命引導着現代人一代一代地前赴後繼。如果說戰爭引導了古典時代的主題，今天則是革命消滅了古典的戰爭，用一種戰爭的技術作為革命的序曲，開啟了一個沒有終點的革命新世紀。

革命不僅包含了構建新秩序的根本需求，更包含了新秩序的基本價值訴求，如立基於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意義上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又如平等的觀念。因此，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變革舊制度，而且要廢除舊的社會結構。

的神經。難道革命是現代政制所釋放的一頭「怪獸」（又作「利維坦」[Leviathan]）？

就此，阿倫特肯定地說：「革命，確切說來，在現代以前並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資料中，方可找到它們。」（頁2）那麼，革命作為一個現代的觀念，到底包含了哪些觀念史的表徵？阿倫特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

第一，革命使用暴力，但絕不等於暴力。顯而易見，革命不是純粹的內亂，它與羅馬史上的動蕩和希臘城邦內部的內亂完全沒有可通之處（頁10）。蘇俄的革命者知道只有通過暴力推翻經濟財富佔有者的統治地位，才能取得革命的初步勝利，但他們也無時無刻不在擔憂俄國的舊經濟能否承受革命帶來的時代性轉換，能否承受起革命所要求的「新天新地」的諾言。暴力——粗暴的力量搏鬥——只有在革命展開的第一步才有實際的意義。

第二，革命意味着一個全新的開端，一場天翻地覆的變化，即使使用第二次「創世」來說明革命的意義似也不為過。當法國國王路易十六（Louis XVI）在1789年7月15日凌晨兩點從夢中被驚醒的時候，拉羅舍富科—利昂庫爾特（La Rochefoucauld-Liancourt）公爵急匆匆地來到國王面前，這位據說在貴族頭銜中雖不是才華出眾但最仁慈、最善良的大臣，想讓他的主子搞清楚目前的事態及其意義。當路易醒悟過來的時候，大聲喊叫：「這是一次嚴重的叛亂。」公爵回答說：「不，陛下，

這是一場大革命！」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在《法國大革命講稿》（*Lectur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稱公爵的回答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措辭」（阿克頓著，秋風譯：《法國大革命講稿》〔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頁92）。

宮廷政變、朝代更替與革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們都使用暴力。但是，如阿倫特所言，「只有發生了新開端意義上的變遷，並且暴力被用來構建一種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締造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從壓迫中解放以構建自由為起碼目標，那才稱得上是革命。」（頁23）革命不僅包含了構建新秩序的根本需求，更包含了新秩序的基本價值訴求，如立基於生命、自由和財產權意義上的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又如平等的觀念。因此，革命的目的不僅是變革舊制度，而且要廢除舊的社會結構。它不得不同時攻擊一切現存權力，摧毀一切公認的勢力，祛除各種傳統，更風易俗，並且從人們的頭腦中蕩滌所有從前一貫培養的服從思想。

第三，革命意味着一種必然性，非人力所能阻擋。「革命」的詞源本是天文學術語，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體運行論》（*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aelestium*）直譯就是《論天體的革命》。「革命」意指有規律的天體旋轉運動，因而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也就是說它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循環往復的周期運動。因此，「革命」一詞用於政治領域，是一種關於政治規律的客觀性

「隱喻」。用阿倫特的話來說，就是「突然之間，一個全新的意象開始籠罩了舊的隱喻，一個全新的詞彙融入了政治語言之中。每當我們思索革命的時候，我們幾乎是不由自主地，腦海裏依然湧現出誕生於那段歲月中的意象——德慕蘭的 torrent révolutionnaire (革命洪流)，在革命洪流的風口浪尖上，誕生了革命的行動者，他們忘乎所以，難以自制，直到回頭浪將他們吞沒，與他們的敵人——反革命者同歸於盡」(頁37)。

因此，革命是一種絕對性的不需要協定的真理，就如傑斐遜 (Thomas Jefferson) 的那句名言：「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頁178) 不言而喻就是對協定(或協商)的忽略。阿倫特於是說，如果我們不是根據十八世紀的革命，而是根據整個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動蕩來看，我們似乎只剩下一種兩可選擇：要麼選擇持續不斷的革命，它不會走向終結，也產生不出以自由立國的結果；要麼是革命動蕩後某種新的立憲政府最終形成，絕大多數公民的自由得到保障。只不過選擇後者的人們常常不是將之視為革命成功的標誌，反而視為革命失敗後被強加的後果(頁127)。這主要受制於法國大革命的傳統。

所以，當傑斐遜從法國大革命的災難中吸取教訓時，他從早期的將行動等同於造反和破壞，轉化為重建和建設。因為在法國大革命中，解放的暴力挫敗了為自由建造一個

安全空間的一切努力(頁219)。傑斐遜發覺了「革命後政治發展的悲劇性疏忽」(頁220)。然而，繼之而起的代議制卻面臨着兩難的境遇：其一，作為人民直接行動的替代品，墮落為單純的行政機關，公共領域則消失了，作為「一名政府參與者」的驕傲也根本不存在了；其二，作為人民代表對人民實施的大眾化控制式統治，人民再度被拒於公共領域之外，要麼陷入冷漠，要麼始終保持着對一切的反抗精神(頁222-23)。因此，傑斐遜的重建也沒能繼承革命的真正精神。

阿倫特認為，革命是現代重構公共領域的最重要的嘗試，它是人類模仿上帝那樣「無中生有」的一種創造，是通過不僅語言 (word) 而且行動 (deed) 進入政治世界的一系列直接努力，因為在那裏才有「公共自由、公共幸福、公共精神」(頁207) 三者融合為一體的可能性。因此，真正的革命精神在阿倫特看來，歸根結底處理的是怎樣過得更好的問題，而非怎樣過得更安全的問題，它乃是古典政治遺產的現代闡釋，是一種城邦再創造活動——儘管革命總是指向未來，而不是回歸古代。阿倫特默認了革命指向未來的事實，但她仍舊試圖在革命不可遏止的世界中極力發揮革命精神之開創新的公共領域的積極意義。

由此，阿倫特借用古希臘雅典代言人忒修斯的語言 (word) 作結：「切勿生而無法言表；生命中次好的東西，其來也急，其逝也疾。」(頁264)

真正的革命精神在阿倫特看來，歸根結底處理的是怎樣過得更好，而非怎樣過得更安全的問題。阿倫特默認了革命指向未來的事實，但她仍舊試圖在革命不可遏止的世界中極力發揮革命精神之開創新的公共領域的積極意義。